

“蠹众而木折，隙大墙坏”

——古泊塔事件剖析

金玉珩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近一年多来，一场涉及印度地质学家古泊塔 (Vista J. Gupta) 的喜马拉雅化石“错乱”问题的争论不仅震惊了古生物学界，而且引起了各国自然科学家和公众的广泛注意。至少有100多家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登载和播送了与之有关的消息和评论。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新闻媒介、科学家、一些印度科研和教育机构，以及国际学术组织从不同的角度介入这一场论争，使情况显得颇为错综复杂。然而，其中绝大多数都高度赞赏警惕地、勇敢地、坚持不懈地识别和揭露喜马拉雅化石“错乱”问题的学者，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泰伦特 (John A. Talent) 的胆识和维护科学界的威严及其研究成果不受糟塌的精神。他们异口同声地批评在古生物和地质研究中，少数人一味追求成果数量，不顾质量，甚至不惜弄虚作假的卑劣行径，并希望各国学术机构和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整肃学风，杜绝舞弊。

一、克什米尔产袋鼠吗？——古生物地理异常的启示

古泊塔系印度昌迪加尔旁遮普大学地质发展研究中心 (The Centre of Advanced Study in Geology) 的高级教授。25年来，他发表了约430篇论著，合计超过4000页，几乎对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地区喜马拉雅各地自寒武纪至侏罗纪的地层时代都作了些修正。浩繁的著作作为他在印度地质学界赢得了相当高的声望。他被接纳为一系列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先后到20多个国家出席了60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俨然成为印度科学界一颗令人瞩目的新星。

然而，就笔者多年来的耳闻目睹，洞悉其论著内容的学术机构和科学家，对他和他的学术成就一直持保留、甚或批评的态度。澳大利亚悉尼麦克夸里大学 (Macquarie University) 应用地质学院的泰伦特博士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是研究志留纪和泥盆纪腕足动物化石专家。他对南亚和中亚古生物地理和板块构造发展、牙形类化石和地质史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曾多次到喜马拉雅和中亚各地考察，并在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任教和讲学。在研究过程中，他不断发现古泊塔等报道的古生物资料充满不确切的和可疑的东西。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地层描述过分简单，层序不清；关于化石产地的资料太笼统；生物群的古生物地理特征混乱；难以确定属及属以上归类的变形或残破化石被鉴定到种级分类单元；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将其它地区的化石冒充喜马拉雅的产物加以研究和报道。20多年来，许多学者对古泊塔的论著不辨真伪，广为引用，造成喜马拉雅地质研究中的混乱。对此，泰伦特一直感到不安。1976年，他先后在两个国际喜马拉雅地质讨论会上指出：“重要化石的产地必须详加报道，以便验证。”1987年，在加拿大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泥盆系会议上，他和两位印度同行在题为“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泥盆系和假想的泥盆系：述评”的报告中，分析了一系列古泊塔报道的古

生物材料,认为这些化石在地层和古生物地理上是可疑的。次年,此报告经充实和修改,形成专著发表 (Talent *et al.*, 1988)。在他们所评述的问题中,最关键的有 1. 泰伦特认为克什米尔 Muth 石英岩为滨岸或潮间带沉积,通常不产笔石。1966 年,古泊塔却报道在克什米尔地区 Gugaldar 产早志留世壳相化石之下的层位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三层晚志留世笔石。泰伦特等根据古泊塔记述的化石产地的地理位置到该地考察后,又发现该地岩石强烈变形,不可能有笔石保存。2. 1967 年,古泊塔报道在斯匹第地区 Muth 石英岩的一层厚 20cm 的白云质砂质灰岩中发现牙形类化石。这些牙形类化石的组合特征和保存状况很独特,与美国弗拉斯早期 North Evans 灰岩的牙形类化石酷似。其中包括一些从未见于其它地区的地方性分子,并且是由几个牙形类化石带的分子经再沉积而混生的组合。古泊塔曾将同一批标本的时代先后定为早泥盆世、中泥盆世和晚泥盆世。而且两次报道的化石产地也不同:一次为尼泊尔的 Phulchauki,另一次为印度的 Kishtwar,相距 600km (Klapper and Ziegler, 1979)。实际上,它们属于弗拉斯早期下 *asymmetricus* 带,而按 Muth 石英岩的沉积环境,那里通常不可能有 *Polygnathus* 相牙形类动物群出现。对 Phulchauki 剖面的详细采集和处理结果表明,其中只有少量早志留世牙形类化石,而并无泥盆纪分子。3. 1983 年,古泊塔与联邦德国著名古生物学家 H. K. Erben 著文报道了产于中印边界 Khimokul La 的 Muth 石英岩上部的菊石。该文指出,其时代为法门晚期,与上述弗拉斯早期的牙形类化石共生。这样,两者的时代至少相差 15Ma。菊石为褐铁矿化标本,属种和保存状况与摩洛哥 Erfoud 所产者如出一辙。4. 1982 年,古泊塔等报道了产于中印边界 Kurig 附近早泥盆世介形虫化石。全部种与著名的美国俄克拉何马州 Haragan 组的一致。早泥盆世介形虫的生物地理分异很显著。在地球两侧发现相同的介形虫动物群自然令人感到惊奇。值得注意的是,Haragan 组的介形虫和 North Evans 灰岩的牙形类标本都曾被分送给各国大学作为教学标本,而摩洛哥 Erfoud 的菊石则是西方化石商店的常见货品。

泰伦特认为在古生代,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喜马拉雅属于消减大陆边缘,沉积相和生物相均相当一致。所以发现这些古生物地理分布和地层位置异常的化石群,好比“在克什米尔找到袋鼠,在河里见到犀牛”,令人难以置信。更何况 20 多年来,实际上只有古泊塔报道了如此蹊跷的化石群。

这一论著的发表轰动了国际科学界。新闻媒介以震撼人心的标题报道此案,如“喜马拉雅骗局”、“化石飘忽不定的真相”(《自然》杂志)、“化石‘错乱’真相”(《科学》杂志)、“古生物研究史上最大的骗局”、“奇怪的伪造化石案”(《悉尼晨报》)、“Piltdown 人头骨化石骗局以来最大的骗局”(《纽约时报》),等等。同时,这些报刊又以副标题竭力强调骗局的危害性。《自然》杂志指出, Piltdown 人头骨化石只涉及一个产地;古泊塔以 1/4 世纪编造的谎言则更难澄清;蓄意错置化石的活动,使喜马拉雅古生物文献混进伪造资料而被扰乱。”《泰晤士报》引用的副标题是“本世纪最大的科学诈骗案激起地质学家的公愤,并可能使整个科学界感到不安。”

二、“喜马拉雅化石”骗局的真相

强烈的舆论冲击使古泊塔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将争论称之为化石分类鉴定的小问题而等闲视之。它引起了古泊塔的同事们、印度地质学界和国家学术机构的密切注意,也导致国际古生物学界,尤其是古泊塔的国外合作者的深思。你来我往的辩论不仅继续在《自然》杂志上进行,而且扩大到《印度地质学会志》(Journal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India),《印度地质

学家协会志》(Bulletin Indian Geologists' Association),《澳大利亚地质学家》(The Australian Geologists)等刊物。

首先,古泊塔(1989)避实就虚,答复泰伦特等提出的指控。他申明:1. 克什米尔 Muth 石英岩所产的笔石曾被后来的工作证实。已故著名古生物学家 M. R. Sahni 曾考察过化石产地。但据 M. R. Sahni 的日记,他没有到过该地(A. Sahni, 1989)。2. 在发表喜马拉雅泥盆纪牙形类化石时,他曾指出这些化石与美国 North Evans 灰岩所产的极为相似。今后将比较研究两地牙形类化石的同位素/元素成分,以说明其区别。但早已有资料证明,喜马拉雅与美国的中和晚古生代动物群中的许多分子都很相似。而且,喜马拉雅确实存在发育完整的志留系—泥盆系层序。3. 在报道喜马拉雅晚泥盆世菊石时也已论及化石的保存特征,并作了X光衍射分析。可能是慢速沉积导致法门期菊石与弗拉斯期牙形类化石的混生。4. P. Janvier 认为古泊塔提供给他研究的产于拉达克地区的泥盆纪骨鳞鱼类化石极可能来自中国,因其围岩、颜色等保存特点和属种与云南产的 *Youngolepis praecursor* 一致。古泊塔声明,他既没有访问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也没有到过云南的化石产地。同时,他还闪烁其词说:“泰伦特和他的同伴想要一些化石产地的资料,而考虑到国家安全,我们不能提供。”“泰伦特访问印度 20 次,每次都是从巴基斯坦来,却从未发表过关于印度的论著,令人诧异的是哪个机构资助一个旅行那么多次,而没有科学成果的科学家?”(Jayarama, 1989)言外之意,泰伦特似乎是巴基斯坦间谍(Talent, 1990c)。古泊塔还认为“泰伦特攻击他的动机不过是显露自己和掩饰在研究喜马拉雅地质方面无所作为罢了”(Gupta, 1989)。

在古泊塔的同事中,也许确实有人曾与于在几十位国外合作者中,没有人愿意站出来维护他们的著作,西方国家的报道又毫无保留地接受泰伦特的观点,而从未征询古泊塔所在机构负责人的意见,因而,感到这场论争带有“种族偏见”(S. Gandhi, 1989)。不过,古泊塔的多数同事对争论的各个方面均深为关切,而且认为这场争论引起了印度地质学者特别是古生物学者的深刻反思(A. Sahni, 1989)。古泊塔的同事 A. D. Ahluwalia (1989), S. B. Bhatia (1989), U. K. Bassi (1989) 都发表了揭露他把同一些标本作为不同产地的化石而发表文章的行为,以及他们对一些化石产地真实性的质疑。

当泰伦特揭发古泊塔的消息披露后,绝大多数外国古生物学家,包括古泊塔的国外合作者都为之愕然,因为古生物学家都相互信赖,从不怀疑,也不会想到他的同行有可能蒙骗他。外国古生物学家之所以乐意与古泊塔合作,是因为他们感到喜马拉雅的任何材料都来之不易,并富有新鲜感和吸引力,而亲自到那里去采集的机会又很少或没有。这些材料经过权威学者的处理,便成为很有意义的成果。有的国外合作者则认为问题被过分地夸大了。H. K. Erben (1989) 指出,没有人能直接证实被古泊塔作为喜马拉雅的标本确实来自其它地方。对此,目前仍然缺乏直接证据,尽管泰伦特搜集的间接证据很有说服力。P. Janvier (1989) 认为,古生物的地方性是难以验证的性质,而只能根据经验性材料的积累而确定。法国地质学界一直对本世纪 20 年代发生的德普拉事件(J. Deprat)* 感到内疚。当他任驻河内印支地质调查队负责人时,在云南发现奇特的三叶虫,却被指控搞乱了化石标本,并因此被解除职务,开除出法国

* 尹赞勋先生曾多次以“德普拉事件”为例,告诫我国古生物学者要准确地记录化石的产地和层位。据他说(张文堂、范嘉松, 1960),曾有学者指出,满苏(Mansuy, 1912)报道的产于云南宜良洗羊塘奥陶系的一块定名为 *Dionide formosa* Barrande 的标本,原产于波希米亚中奥陶世地层,后来满苏也承认。经卢衍豪(1975)研究,此三叶虫标本的形态特征与后人重新描述的波希米亚所产的此种标本一致,因而不认为云南产此种化石。由此可见, P. Janvier 关于德普拉事件系一错案的说法有误。最近他来信表示“错案”一说不确。

国地质学会。这些三叶虫被认为属于波希米亚的“Barrandian”动物群,据说标本上的胶水与巴黎矿业学院收藏标本上的胶水都一样。遗憾的是以后又发现,这些有问题的三叶虫产地和层位完全正确。这种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再者,在伪造和诚实的错误之间并无截然的界线,所以在指控他人舞弊时应当谨慎从事。也有个别国外合作者,如曾与之长期合作的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瓦特豪斯(J. B. Waterhouse)支持古泊塔。他以《神圣的喜马拉雅——骗局还是无稽之谈》为题(1989)发表文章,责备泰伦特过分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太多的猜想和假设而缺乏可靠的证据。他认为古泊塔的大部分工作,包括大部分与国外专家合作的成果是有价值的。但又不得不承认也有一些缺陷,需要核对;“有些标本可能会是从国外买来的或假冒的。”

一年多来,关于古泊塔采用“冒名顶替”、“移花接木”等手法,伪造喜马拉雅化石,炮制古生物学论著的佐证不断被揭发出来。这是一系列无可辩驳的事实。泰伦特等(1990)至少从古泊塔的文章中挑出6个“冒名顶替”——将同一批化石使用不同的产地和层位发表的例子。例如,1986年古泊塔报道的产于斯匹第地区下石炭统的牙形类化石,就是10年前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报道的产于拉达克地区的标本,不过化石名单全部更改过了。令人气愤的是,这些标本既非产于拉达克地区,也与斯匹第地区无缘,而是Webster(1990)应古泊塔的要求送给他作教学标本的美国化石!又如,有两块石炭纪珊瑚标本,先后被用于1985年、1986年和1989年发表的3篇文章中,并使用了3个不同的产地。他还使用多种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如把外国专家以法文发表的论文(Savage, 1977),改头换面用英文在印度发表(Gupta and Kachroo, 1977);抄袭送审的研究生论文的内容,却不注明材料来源和志谢(Talent *et al.*, 1990)。在他的文章中,甚至还翻印Reed(1908)关于缅甸掸邦北部泥盆纪化石专著中的图象,作为喜马拉雅化石的图象(Gupta, 1970);以加拿大中寒武世三叶虫的照片(Rasetti, 1951),冒充克什米尔地区化石的照片(Gupta, 1967, 1971)。更为恶劣的是,古泊塔居然利用在英国威尔士Aberystwyth学院地质系做博士后的机会,盗窃H. P. Lewis研究过的威尔士北部石炭纪珊瑚化石薄片,冒充喜马拉雅所产的标本予以报道。其中,于1969年和1971年,发表的克什米尔地区管孔石燕灰岩所产*Caninophyllum archiaci*横切面图,与1929年Lewis发表的威尔士石炭纪该种的一个横切面图雷同,而该学院保存的这一薄片却已不翼而飞(Wyatt, 1990)。点滴的错误也许可以推托为偶然的疏漏或唐突行为所致。这一系列丑行则证明古泊塔一贯地肆意践踏科学道德,利用各种手法,伪造通常很难采到而又富有科学意义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化石,连篇累牍地发表论著,公然欺骗同行,盗名窃誉。

三、古泊塔事件的后果和诱因

古泊塔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求实和严谨的学风是一切科学发现的基石。如果科学家或科研集体不能创造和保持一个以学风严谨为荣的环境,不能始终如一地以高尚的学风指导科研活动,一旦失去信誉,他们的一切科研成果都会失去应有的光彩。现在看来,不仅古泊塔的全部论著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令人怀疑,而且一系列关于喜马拉雅地质的著作,包括如《印度地质》等权威著作也因援引大量古泊塔伪造的“资料”而需要修正。“蠹众而木折,隙大墙坏”。如果不能及时制止歪风邪气蔓延,防患于未然,而容忍极少数科学家败坏科学道德,结果必将危及整个科研机构 and 全国学术界的声誉。《印度地质学会志》社论不无遗憾地宣称:“印度古生物学蒙上了疑云”,此案“不仅是对古泊塔的诚实性的质疑,也反映了以喜马拉雅地质研究成绩斐然而著称的那个地质机构的声望;这不仅关系个别科学家的体面,也涉及整个印度古生物学界的

信誉”(Radhakrishna, 1989)。

为什么古泊塔制造了充塞着大量伪劣内容的论著却长期得不到揭发？为什么他的论著内容庞杂、重复、数量惊人，不仅得不到批评，反而受到赞许？

现代科学再也不是象牙之塔中的精雕细琢的活动了。在国外，科学家必须投身到艰苦的社会竞争中去，为争取科学基金、发现权和专利权，以及学术地位等而努力。诚实的科学劳动变得越来越困难。持续的课题资助、提高知名度和得到晋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出版品的数量，而往往可以忽视其质量。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出版尽量多的论著，成为科学家的一种职业压力。P. Janvier (1989) 指出，在法国，“许多古生物学家这样做，因为他们被迫这样做。”“有的以不同的文字发表实际内容相同的文章，有的将某一动物群按类群、甚至按化石逐一发表。”“据说这样容易估价研究者或研究队工作的透彻性和勤奋水平。”显然，古泊塔的迅速晋升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连篇累牍的论著。

另一方面，科学家们都不愿意指出和揭露同事的错误。由于科学研究领域高度专业化，科学出版品中的伪劣成分只有极少数专家能掌握，因此，其影响范围很有限，而往往被作为唐突行为而不予追究。不过，如加以全面考察，也许那只是构成整个骗局的一部分。

近 10 年前，一些印度和国外的古生物学家就曾经指出，古泊塔把同一批标本分别使用两套属种名，两个产地，发表两篇文章 (Klapper and Ziegler, 1979)；他报道的古生物发现值得怀疑，所建立的地层层序不符合实际 (Srikantia *et al.*, 1978; Agarwal and Singh, 1981)。可惜，当时这些都没有立即引起同行的重视，对渎职者群起而攻之，维护职业道德的威严，以致古泊塔有恃无恐，其恶行并未有所收敛。

总之，忠实于客观系科学研究者的职业性责任。如果研究者屈从于社会性压力或为个人名利所驱使，就会回避他应当履行的职责，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倘若研究者放弃科学的目的，转而完全追求私利，就会冒“出卖类灵魂”的危险。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存在或曾经发生这类问题。在古生物和地质研究方面，通常因学风不正，往往导致研究态度不够严肃，研究方法欠严谨，研究成果处理不严格。蓄意伪造“资料”和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堕落为欺世盗名的学术骗子，如古泊塔者，在整个研究史上也寥寥无几。这是极少数品质低下、混迹科学界的人员，外界环境和压力对他们只是一种诱发因素。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各国古生物工作者都从古泊塔事件领悟到有益的经验教训，我国古生物学界也不应例外。虽然，我国古生物研究的成果，由于老一辈古生物学家的努力，曾以严谨的学风而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威望。他们所倡导和坚持的“三严”（严肃、严谨、严密）学风成为我国广大古生物工作者遵奉的治学精神。至今，不顾科学道德，公然伪造“资料”和剽窃他人成果的事还鲜有所闻。即使发现了化石“搬家”的情况，例如，将华南区的 *Yunnanella* “移植”到大兴安岭（常安之，1958），也能及时处置，使之成为反面教材，引为鉴戒。然而国内和国外的许多古生物学家都深深感到，要将我国古生物研究推向新的水平，必须努力改进治学风尚。

首先，严肃的古生物学者应始终诚实地以最大的准确性记录化石及其产地和层位，足以使其他研究者能重复采集、证实或否定，从而为丰富古生物宝库作出贡献。当他们引用前人积累的资料、方法、思想观点阐述古生物学及相关的问题时，必须一直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以便他人追索论据的可靠性及说服力。可供交流和检验是自然科学的本质特征。那些回避交流和检

验的古生物学资料,绝不能成为令人信服的科学成果而为同行们接受。因此,关键化石的产地、层位和采集号应当详细记载;作为新属、新种的核心和固着点的模式标本,应交给学术机构妥善管理;模本保管单位应为再研究提供无偿服务。作为重大发现而发表的化石群,却不公布其具体的产地层位,或不愿给同行检验模式标本提供方便者,应当受到古生物学界的批评和抵制。引用他人的实际资料、思想观点而不注明来源,以致无法考查的现象,再也不能任其发展下去。反之,必将引起关于发现权、著作权和命名优先权等的恼人纠纷。必须指出,研究者如果能抱着科学、谦逊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援引和评价他人的思想、材料和成果,他的品格和学术水平都会恰如其分地得到同行的尊重。即使是错误的鉴定、片面的观点,只要论述是诚实的,允许别人考察和讨论,就不是有意骗人的东西,对于科学进步会有一定的意义。相反,一些经报章过分渲染的、惊人的古生物“发现”和独特的“理论和创见”,通常都不在学术刊物上科学地报道,而其化石产地的地质情况或论据来源等方面往往经不起推敲。

其次,化石的室内分类研究要求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有关类群的资料,慎重的鉴定,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这也是研究者收获的时节,他们往往为新分类单元的发现而激动不已。不过就社会效益而言,只有建立有据的新分类单元才是给人类增添财富。人为的新类群和别出心裁的“创新”将是留给同行的一笔债务。无视分类命名的规范和分类学原理,不顾参考资料的贫乏,和对化石特征缺少了解,贸然提出大量新分类单元,只会给研究者及其成果带来身价低落的社会效果,和令人失望地扰乱已被广泛应用的自然分类系统。近些年来,我国古生物分类研究不乏全面精深而为国内和国外古生物学界称道的著作。同时,因工作条件限制,许多著作还未能准确、系统地反映出地区性生物群的面貌。极少数研究者建立了大量新分类单元,以为多多益善,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当前的分类状况之杂乱已使鉴定者无所适从,以致我国古生物研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整理和提高分类结果的任务。例如,在 1970 年至 1987 年间,我国研究者共建立腕足动物化石新属 363 个,占同期全世界腕足动物化石新属的 1/4,数量十分惊人。然而,有效率却很低,3 个或 4 个新属名应归为 1 个属的情况并非个别;志留纪和石炭纪新属的有效率不到 70%。倘若按不同的研究者统计其新属的有效率,结果使人感到更为沮丧。属级情况尚且如此,种级的状况显然要杂乱无章得多。这种局面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国古生物学界的警觉吗?

在当前形势下,古泊塔事件提醒我们,应当大力支持和鼓励善意的、公开的学术评论,反对背地散布论。对科研成果严肃、认真、负责任的学术评论,不仅能引导学术界正确认识学术论著的实际价值,而且有利于维护学术界既踏实、严谨而又敢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和提倡尊重真才实学、不图虚名的风气。而且,一份有见地的出色的学术评论本身就是一项优秀的研究成果。评论者必须细致地考查该论著的材料和论据,还应当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敢于直言的勇气。泰伦特的评论就是一个范例。当然,另一方面,科学家们都应坚持谦虚好学、乐于反思的态度,主动净化“百家争鸣”的环境。否则,会使以追求真理为崇高目的的学术争论,沦为维护私利的纠纷。部分权威科学家指出,未能建立一种严肃认真地评议和评论同行的工作成果的风气,是导致一些国家的科学发展迟缓的重要障碍 (Radhakrishna, 1990)。

古泊塔事件还提醒我们,当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日益增多时,应当十分严肃谨慎处理国际交流合作活动。古泊塔惯用的手段是,他提供化石及其产地和层位的资料,请外国专家鉴定、描述并成文发表。多年来,至少有 65 位外国专家与他合作发表文章。当他们得知其化石产地有问题后,极大多数国外合作者都感到局促不安。教训是深刻的。首先,应当警惕和防止国际

学术交流合作活动中的投机舞弊行为。其次,为国际合作项目提供的化石标本和地质资料,应当翔实、可靠。在混乱的材料基础上是不能创造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的。

必须指出,被古泊塔搅乱的地质和古生物资料,与近几十年来获得的喜马拉雅地质研究的整个成果相比,毕竟只是沧海一粟。有些近期发现的地层序列和古生物群特征是客观存在的,不必因为古泊塔曾经赞同而受到怀疑。例如,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表明,喜马拉雅的志留纪和泥盆纪沉积序列相当完整,拥有丰富的笔石、头足类、竹节石、牙形类等浮游相化石(王义刚等,1984;穆恩之、陈挺恩,1984;杨曾荣,1985;饶靖国、喻洪津,1985;饶靖国等,1988)。克什米尔等地区的 Muth 石英岩在时代和层位上可以与西藏南部的志留系一泥盆系对比。假如因喜马拉雅地区古生代的岩相和生物相确如泰伦特描述的那样相当一致,那么,在克什米尔等地区发现笔石等浮游相动物化石则不能视为异常情况;Muth 石英岩至少不限于滨岸或潮间带沉积,在地层时代上绝不限于志留纪。

又如,喜马拉雅一些古生代动物群与北美同时代的动物群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是很值得探讨的客观现象。石炭纪的腕足动物化石群与北美的关系,远比与欧洲和华南的关系密切。地球两侧的动物群异常相近并不稀罕,当今的和地质历史上的两极分布现象就是例证。

现在,古泊塔事件已真相大白。《印度地质学会志》再次发表社论,敦促反应迟缓的旁遮普大学当局迅速采取措施,追究此事(Radhakrishna, 1990)。国际潘德尔学会最近发表声明开除古泊塔的会籍,并呼吁同行们揭露古泊塔伪造的“资料”。泰伦特等(1989a, b)曾指控古泊塔等报道的产于拉达克地区泥盆纪鱼化石 *Youngolepis praecursor* 应来自我国云南,产于斯匹第的 *Spinocyrtia* sp. (Gupta, 1987) 实际上属于我国广西郁江组 *Euryspirifer tonkinensis* (Mansuy) 的小个体标本。这些标本可能是古泊塔在访问中国时得到的。据笔者了解,古泊塔虽曾三次来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但并没有人送过他化石标本。因此,这些标本究竟来自何处,仍成问题。若有知情者提供线索,则有助于解开这个谜题。

志 谢

1982 年,笔者访澳期间,应泰伦特之邀到麦克夸里大学观察他采自喜马拉雅各地的化石。故友重逢,直抒胸怀,泰伦特陈述了一系列古泊塔蓄意蒙骗同行的事实。当时,国际古生物学界对古泊塔的治学态度颇有微词。这些引起了笔者对古泊塔的警惕,促使笔者多次谢绝与之合作交流的提议。自 1988 年发表揭露古泊塔的专论后,泰伦特一直及时地给笔者寄送有关的报道和评论,并来信详细介绍背景情况。对泰伦特博士为了科学进步,坚持不懈地揭露古泊塔的渎职行为的斗争,以及客观和诚实地给笔者提供有关古泊塔事件的信息,笔者谨表示敬意和感谢。成稿过程中,徐珊红、王化羽曾协助整理材料;稿成之后,承蒙盛金章、文世宣、邓龙华、戎嘉余、陈楚震、陈丕基、廖卫华、穆西南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对此笔者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参 考 文 献

- 王义刚、孙东立、何国雄,1984: 特提斯喜马拉雅南部分区地层。西藏地层,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14—101 页。科学出版社。
- 卢衍豪,1975: 华中及西南奥陶纪三叶虫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新乙种,第 11 号。
- 张文堂、范嘉松,1960: 祁连山奥陶纪及志留纪三叶虫。祁连山地质志,第 4 卷,第 1 分册,83—149 页。科学出版社。

- 杨曾荣, 1985: 西藏南部地区的志留系。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16, 35—51 页。
- 常安之, 1958: 大兴安岭海神石灰岩地层古生物群和古地理的研究并讨论中国南部上泥盆纪后期的间断。古生物学报, 6(1): 71—89。
- 饶靖国, 喻洪津, 1985: 藏南地区的泥盆系。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16, 51—75 页。
- 饶靖国, 张正贵, 杨曾荣, 1988: 西藏志留系泥盆系及二叠系。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穆恩之, 陈挺恩, 1984: 西藏南部志留纪地层的新材料。地层学杂志, 8(1): 49—55。
- Agarwal, P. N. and Singh, S. N., 1981. Micropalaeont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marine Triassic rocks of the Himalaya, J. Palaeont. Soc. India, 25: 110—125.
- Ahluwalia, A. D., 1989: The peripatetic fossils: part 3. Upper Palaeozoic in Lahul-Spiti. Nature, 341: 13—15.
- Bassi, U. K., 1989: The peripatetic fossils: part 3. The Kinnaur region. Nature, 341: 15—16.
- Bhatia, S. B., 1989: The peripatetic fossils: part 3. Devonian ostracodes. Nature, 341: 15.
- Erben, H. K., 1989: Careless, or good faith? Science, 245: 1165—1166.
- Gandhy S., 1989: Himalayan blunder? The 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 (May 28).
- Gupta, V. J., 1967: New Trilobite species from the Naubug Beds, Kashmir. Res. Bull. (n. s.) Panjab Univ., 18(3—4): 351—355.
- Gupta, V. J., 1969: Fossils from the Naubug Beds, Anantnag district, Kashmir. Res. Bull. (n. s.), Panjab Univ. 20 (1—2): 391—404.
- Gupta, V. J., 1971: India Palaeozoic fossils. Centr. Adv. Stud. Geol., Panjab Univ. (Chandigarh), pub.9, pp. 1—100.
- Gupta, V. J., 1989: The peripatetic fossils: part 2. Nature, 341: 11—12.
- Gupta, V. J., 1990: The peripatetic fossils: part 4, A response to the coauthors. Nature, 343: 307—308.
- Gupta, V. J. and Erben, H. K., 1983: A Late Devonian ammonoid faunule from Himachal Pradesh. Palaeont. Zeitschr., 57(1—2): 93—102.
- Gupta, V. J. and R. K. Kachroo, 1977. Carboniferous conodonts from the Lunsak valley of Zaskar tehsil, Ladakh district, Jammu and Kashmir. Recent Res. Geol., 3: 206—208.
- Holden, C. 1989: Gupta's defence. Science, 245: 1192.
- Janvier, P., 1989. Breakdown of trust. Nature, 341: 16.
- Jayaraman, K. S., 1989. Gupta affirms authenticity. Nature, 338: 694.
- Klapper, G. and W. Ziegler, 1979. Devonian conodont biostratigraphy. In: House, N. R. *et al.* (eds.), The Devonian System. Spec. Pap. Palaeont., 23: 199—224.
- Lewin, R., 1989: The case of the "misplaced" fossils. Science, 244: 277—279.
- Radhakrishna, B. P., 1989: Indian palaeontology under a cloud. J. Geol. Soc. India, 34(6): 561—563.
- Radhakrishna, B. P., 1990. Inaction on a Himalayan Scandal. J. Geol. Soc. India, 5: 555—559.
- Reed, F. R. C., 1908: Devonian faunas of the North Shan States, Burma. Geol. Surv. India Palaeont. Indica, (n. s.), 2(5), 1—183, 20 pls.
- Sahni, A., 1989. Sahni visit denied. Nature, 342: 338.
- Savage, N. M., 1977: Conodontes du début du Carbonifère inférieur des calcaires à Syringothyris du Cachemire. In: Jest, C. (Ed.), Himalaya; Sciences de la terre, 2: 333—345. Centr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 Srikantia, S. V., O. N. Bhargava and H. M. Kapoor, 1978: A note on the occurrence of Eurydesma and Deltopecten assemblages from the Kuling Formation (Permian) Baralacha Ban Area, Lahaul Valley, Himachal Himalaya. Geol. Soc. India, 19: 73—78.
- Talent, J. A., 1989a: The case of the peripatetic fossils. Nature, 338: 613—615.
- Talent, J. A., 1989b: The "misplaced" fossils. Science, 246: 740—741.
- Talent, J. A., 1989c: Rhinos in Rio? An update. The Australian Geologist, (7): 39—40.
- Talent, J. A., 1990a: The peripatetic fossils: part 5. Nature, 343: 405—406.
- Talent, J. A., 1990b: Himalayan geology again: curiouser and spuriouser. The Australian Geologist, (74): 42—46.
- Talent, J. A., 1990c: Peripatetic fossils: V. J. Gupta's response rejected. Bull. Ind. Geol. Assoc., 23(1): 39—61.
- Talent, J. A., G. A. Brock, M. J. Engelbreetsen, M. Kato, R. Morante and R. C. Talent, 1989: Himalayan palaeontologic database polluted by recycling and other anomalies. J. Geol. Soc. India, 34: 575—586.
- Talent, J. A., R. K. Geol., R. K. Jain, and J. W. Pickett 1988: Silurian and Devonian of India, Nepal and Bhutan: biostratigraphic and palaeobiogeographic anomalies. Jour. Forsch.-Inst. Senckenberg, 106: 1—57.
- Waterhouse, J. B., 1989: Holy Himalayas—hoax or hogwash? The Australian Geologist, (73): 41—42.
- Waterhouse, J. B., 1990: The peripatetic fossils: part 4, A case of exaggeration. Nature, 343: 305—307.
- Waterhouse, J. B. and Gupta, V. J., 1987: A significant new Permian athyrid brachiopod from the uppermost Gungri Formation (Kuling or Products Shale) at Spiti,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classification and correlation. Bull. India Geol. Assoc., 17(2): 139—143.
- Webster, G. D., 1990: Scientific fraud. The Pander Society Newsletter, (22): 4—6.
- Wyatt, A. R., 1990: V. J. Gupta and the Aberystwyth fossil collection. Jour. Geol. Soc. India, 35: 587—592.

THE ROTTEN APPLE INJURES ITS NEIGHBOURES —A PROFILE OF THE GUPTA'S CASE

Jin Yu-gan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Academia Sinica*)

Summary

This is a brief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oversy over the scientific frauds connected with V. J. Gupta, an India professor of palaeontology and stratigraphy in Panjab University at Chandigarh with comments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To Chinese palaeontologists and geologists with international research background, V. J. Gupta is not a stranger. They have met him frequently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a, at least for three times in China. Being deeply impressed by his voluminous publications with confused data, they have accepted cautions in evaluating his peculiar style of study repeatedly given by some respectable foreign colleagues. Consequently, they are reluctant to favour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s held in China, such as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arboniferous Stratigraphy and Geology, and to support his suggestions of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He has never got any opportunity to visit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as desired. Nevertheless, the Chinese scholars are actually surprised by V. J. Gupta's scientific fraud alleged by Dr. John Talent as no one has even thought of the possibility that as a senior professor he would with intent defraud the palaeontological circle for so many years. Two Chinese participants in the field conference held in Brescia, Italy had a look at several camelicanid specimens immediately after V. J. Gupta had collected them from the outcrop of the Bellerophon Formation at Sass de Putia in Northern Italy. While reading the paper reporting the occurrence of the Camelicanid in the Himalayas (Waterhouse and Gupta, 1987), one would be astonished at their appearance since they are the latest Permian brachiopods with very restricte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but no one would suspect these are the same specimens which V. J. Gupta showed them. In this sense, the whistleblower of this case with a keen insight into this matter is most applauded. In order to keep a clear course, a lesson learnt from such hard knocks will be significant to palaeontologists in India as well a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anks to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Chinese pioneer palaeontologists, a healthy style of palaeontological and stratigraphical work has become prevalent in China. Taking Deprat's case as a negative example, which is actually not a case mistreated as Janvier (1989) previously described according to 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late Professor Yin Zan-xun warned his colleagues very often that the occurrence of fossils must be located and reported as precisely as possible. The case that the genus *Yunnanella*, a Late Devonian endemic brachiopod of South China was misplaced in the Hingan Mts. (Chang, 1960) was seriously treated. However, the impact launched in the late sixties created tremendous difficulties in keeping such an intellectual climate. Fortunately, it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 the last decade, yet there is still a distance to full recovery. It claims attention to some aspects such as encouragement of critical reviews on publications so as to remedy the weakest links of chain, which might be the potential-ground for scientific fraud.

The experience of research work on geology of the Himalayas convinces us that V. J. Gupta's

voluminous publications can not be counted as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data in establishing the palaeontological and stratigraphical framework of this region. All those false data reported by him alone or together with his co-authors should be swept off.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ue palaeontological and stratigraphical features of the Himalayas should not be obscured. For example, the Silurian graptolites fauna recorded by Gupta (1969) was proved to be spurious by observation in the field; the localities of Devonian conodonts, ammonoids and ostracods reported by Gupta and others were found to be from North America and North Africa judging from preservation and palaeobiogeographical affinities. However, these facts will not rule out that the Muth Quartzite in Kashmir and its equivalents in other areas of the Himalayas do not contain Silurian graptolites and Devonian pelagic faunas. A fully developed sequence of Silurian and Devonian pelagic deposits in Southern Xizang has been well documented (Mu and Chen, 1984; Rao, Zhang and Yang, 1988). In addition, the Devonian and Carboniferous faunas between the Himalayas and North America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should not be referred to a bizarre palaeobiogeographical anomaly but remain an interesting problem for further stud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se faunas are considerably different from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the regions nearby such as West and South China.